溯源——沃尔夫理论的回归

**摘要**：语言相对论，人们通常又叫它“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但事实上，就沃尔夫留下的论文内容来看，“语言相对论”不过是沃尔夫丰富思想的一部分。沃尔夫注意研究语言的相对性的同时也关注到语言的普遍性，而且他比乔姆斯基早20年提出类似“普遍语法”的“高层自我（或称高层心理）”的主张；但均因其中之一“语言相对论”受到的过分关注而隐退到幕后，很少有学者关注并涉及。仅就“语言相对论”而言，西方学者的研究基本上是沿着实证主义的道路发展，在颜色词与颜色感知、虚拟式与反事实假设、词汇与物体分类等方面进行一系列实验、讨论和争鸣。但值得注意的是，对这一理论的证实和证伪，尤其是证伪，在很大程度上都曲解了沃尔夫的本意，对语言相对论涉及到的两个基本概念“语言”和“思维”只是按照各自的的理解设置实验。可以说，在缺乏与沃尔夫“直接对话”的情况下所做的实验，其实验材料本身的适切性就是值得商榷的。国内学者就语言相对论的议论基本大多也仍是基于对沃尔夫思想的简单介绍或概括性评论，同样缺乏对理论本身的透彻了解。鉴于此，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应当首先回归文本，阅读原著，唯有如此，才能还原沃尔夫理论的“庐山真面目”，从而在此基础上进行评判和延伸。

本文通过对针对沃尔夫假设所做的一些理论拓展和证实证伪实验的分析，厘清其得失；并从沃尔夫论作本身出发汇总其原作中涉及语言与思维及其二者关系的论述，并补充沃尔夫理论中关于“普遍性”和“高层自我”的相关内容，穿插个人的理解和思考，以期对沃尔夫理论有一个较为整体的、客观的认识。

**关键词**： 沃尔夫理论 语言 思维 语言相对论 高层自我

**引言**：语言对思维是否产生影响？产生怎样的影响？语言相对论中的“语言”是什么？“思维”又是什么？沃尔夫是怎样界定二者关系的？我们在借鉴思想资源以建构理论大厦或指导具体实践时，理应对资源本身有一透彻了解，并在此基础之上评估其价值。接下来我们将首先把关注的视角放在引起争议最广泛，分歧最大的“语言相对论”上。

**综述**：

一、回顾——萨皮尔—沃尔夫假说的形成及其过程

关于语言和思维关系的讨论由来已久，古希腊时期，柏拉图（Plato）就认为，思维就是无声的语言，二者具有内在的不可分离的关系；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则认为语言只是思想的符号，思维不等于语言[[1]](#footnote-1)。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德国新人文主义思潮影响下，赫尔德（Johann Gottfield von Herder）出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工具、内容和形式。他还进一步指出，语言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对世界的解读、经验及主观意识间的理解不断积累的历史。洪堡特（Wihelm von Humboldt）继承和发展了赫尔德的许多重要思想，他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说，讲不同语言的人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具有不同的思维体系，从而进一步发挥了赫尔德的“一种民族语言形成一种世界观”的看法[[2]](#footnote-2)。

之后，随着语言学和人类学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猜想的重心转移到了美国。美国人类语言学家、结构主义语言学派代表人物鲍阿斯（Franz Boas）在德国受到过严格的自然科学和古典语言学的训练，他通过对墨西哥以北的美洲印第安土著语的调查，提出：描写一种语言只能根据它本身结构对语言事实作客观的描写，不能也不应该用其他的语言结构来套这种语言，语言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每种语言的特殊结构，“描写本身即是目的”，开创了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道路，并首先把人类学划分为四个领域：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物质人类学和语言学[[3]](#footnote-3)。在其晚期著作中时常有这样的语言表述：语言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决定人类的思维活动，语言对文化具有无限的影响。但是由于鲍阿斯没有系统和清晰的阐述过他的关于语言与思维和文化之间关系的观点，因此语言学界通常不把鲍阿斯当做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创始人之一。

萨丕尔（Edward Sapir）师从鲍阿斯，继承了鲍阿斯关于语言对客观事物和经验范畴化的思想，并对语言的系统性、特别是对语言对思维的影响作了清晰明确的阐述。他认为语言的不同，仅仅是表达共同经验的表达模式不同，而不是经验本身的不同；语言的差异不是各自分类体的内容不同，而是各自系统的、形式的排列不同；对语言形式和系统方面的强调，是萨皮尔观点的重要标志。在他看来，并不存在一个客观的、一成不变的现实世界，而只有一个由时间组成的没有固定疆界的连续系统，每一种语言都按着自己的结构来划分和解释这一时空[[4]](#footnote-4)，因此他被语言学界公认为假说的创始人之一。

沃尔夫（E.L.Whorf）作为萨丕尔的“半路弟子”，在其27岁之前，由于在麻省理工学院接受了化学工程的训练，因而掌握了一套实验室的研究方式和参照框架，毕业后被哈特福德火险公司选中，又以其接受的良好训练知识以及应用能力，他的敬业精神和洞察力，极受公司器重。沃尔夫在外出时经常将防火观察与语言调查结合起来，在27岁时对语言学燃起了确定无疑的热情（沃尔夫自称），并在语言学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公司为其感到骄傲，曾数次慷慨的准嫁给他做语言学调查，不过也可能正是由于他的这些独特经历，导致他在语言学方面提出的理论非议不断。“在我看来，人们之所以对它争论不休，原因之一是他并非科班出身。”事实上，“在语言学这门相当新的学科当中，沃尔夫是一位深刻的学者”。对语言的热情和冷漠的科学理性在他的体内交融，由此催生出的思想可能比单纯的语言学家更有某种意义上的优势。

如前所述，沃尔夫师从萨丕尔，他的观点更多的是建立在火险公司的工作经历和他对美国印第安语（如玛雅象形文字、阿兹克特语、霍皮语等）语言研究基础之上的。比如沃尔夫认为，印欧语言——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拉丁语、希腊语等是大致可以校准的；但是汉语、玛雅语、霍皮语等语言结构的校准，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也是十分困难的。讲汉语的人，对自然和宇宙的切分，不同于讲西方语言的人，而各种美洲印第安人、非洲人以及讲其他语言的群体，其切分又是另外的样式，由此他说：“我们因此有了一种新的相对论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同样的物质证据，并不能使不同的观察者得到同样的宇宙图像，除非他们的语言背景相似，或者可用某种方式校准。”[[5]](#footnote-5)这或许是印欧语言的分析方法在汉语领域“水土不服”的又一解释。

西方学者在谈及沃尔夫时，常津津乐道于“空汽油桶”引起火灾的趣闻。沃尔夫发现，在被称为“汽油桶”的存放的周围，人们会格外小心翼翼；而在被称为“空汽油桶”的周围，人们则麻痹大意，随便吸烟或乱扔烟蒂，从而引爆桶内的爆炸性气体。虽然从物理学意义上说，“空汽油桶”更具危险性，但根据常规，语言上只能用“空”来命名他们，而“空”不可避免的示意无危险，从而引导人们做出危险行为。随后，沃尔夫又举出了石灰石纤维、沸腾的清漆等大量实例，得出结论：语言形式的类推可以对行为作出引导性提示。“语言形式为情境套上某个定义，并由此作出某种程度的分析、归类，将它分配在一种世界格局中，而这一世界格局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一个社团无意识的语言习惯基础之上的。”[[6]](#footnote-6)

由此又涉及到另一个著名的例子——爱斯基摩的雪。希望在此澄清这个越传越离谱的谣言。1911年时，鲍阿斯的《The Handbook of North American Indians》里曾大概介绍过爱斯基摩人对于雪的描述，爱斯基摩人在提到不同的雪时，会采用不同的词根。他她举了4个例子：

Aput—落在地上的雪 piqsirpoq—堆积的雪

Qana—掉落的雪 qimuqsuq—雪堆

而在沃尔夫《Science and Linguistics》中，则变成了“英语中的‘snow’这个词，对爱斯基摩人来说，类别太大，包容的东西太多了，简直无法想象”。并列举了六个不同形态（但并未给出具体的单词）并暗示说还有更多类似的词语。最后到了1988年的纽约时报，这个数字变成了48个！但据宾夕法尼亚大学语言学教授Geoffrey Pullum考证，在因纽特语里，有关“雪”的词根大概只有六七个，和英语里单独描述“雪”的单词数量不会差太多；但是因纽特的粘着式形态可以允许在每一个词根后加上无穷多词缀，相当于用一个词完成一句话。[[7]](#footnote-7)这可能是沃尔夫在论证理论列举例子时的一个最大败笔了。

接上，沃尔夫进一步认为，讲不同语言的人，所看到的宇宙不同，对他的评价也不同，这种差异有时大，有时小。思维相对于所掌握的语言而定，不存在原始落后的语言。除此之外，沃尔夫也提出了语言的普遍性和“高层自我”的理论主张，这些在正文部分将详细阐述。总之，沃尔夫大大发展了萨皮尔的观点，对语言和思维的关系进行了更详尽充分的表述，沃尔夫本人并未给自己的理论观点命名，后来的美国语言学家卡罗尔（J.B.Carroll）将他们的观点称为“萨皮尔——沃尔夫假说”。

二、评析——关于假说的理论拓展和证伪实验

在谈及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时，学界的一个“惯例”是后接这样一句话——“我们会在之下区分两个强弱力量不同的假设”，或者还有更明确的说法——“沃尔夫假说包含两部分：语言决定论和语言相对论。”[[8]](#footnote-8)由于两个并没有对假说给出具体的定义，因此这就给后世学者对其理论的阐释留下了很大的空间。[[9]](#footnote-9)截取沃尔夫著作中的只言片语，确实能够概括出两个看似部分矛盾的观点。“语言决定论”认为一个人的思维完全由母语决定,语言不同的民族，其思维方式不同; “语言相对论”则认为语言中的结构和我们平时习以为常的语言用法，可能会对我们的一些思维方式和日常行为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人们一般倾向于相对论，而否定语言决定论。但国内学者鲍文则认为，二者并不矛盾，并从三段论的推理过程指出了其中的逻辑谬误[[10]](#footnote-10)；但其实还有更简易的理解方式：语言决定论认为“语言不同的民族及思维方式不同。”那么也就是说，语言有相似点的民族，其思维方式也是有相似之处的。那又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

①联系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世界上不存在完全不同的语言，也不存在完全相同的语言；

②语言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各具体语言之间都是有一定关联相似性的，即思维方式也是有相似之处的，所以“强假说”从这一层面上讲是理解得通的。正如鲍文所言，“强假说”只是与“弱假说”在语言对说话者的思维方式上的影响程度不同。同时这也有效的反驳了Fishman认为“沃尔夫假说可能导致两种恐惧”的说法：一种是无援的恐惧（horror of helplessness），我们都不能不说话，因此无法逃脱语言的摆布；另一种是绝望的恐惧（horror of hopelessness），因为这意味着人类没有希望能够互相了解和交际[[11]](#footnote-11)。

假说自问世以来，就在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学等领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赞同和反对的双方主要通过实证的方法，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寻找相关的证据来证实或推翻它。

在许多“证实”实验当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颜色研究”，人类学家列奈伯格（E.H.Lenneberg）在1956年对美国西南部新墨西哥州的斯尼族做了一次关于颜色知觉的实验。在斯尼语中，黄色和橙色是由同一名称来表示的。实验中把各种各样的颜色板给测试对象辨别。结果发现，无论是哪一民族的人，都能准确的辨别有各种细微差别的色彩（60年代末，柏林凯和罗西的反搏实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即所有人都有相同的对色彩中心的辨认能力），“但对那些粗略的色彩那边却辨别不清楚，例如基尼人就无论如何也分辨不清黄色和橙色。[[12]](#footnote-12)”

请仔细研读上段话，我们很容易会发现，这句话前后矛盾：既承认“每族人都有准确辨别各种有细微差别色彩的能力”，却又说“基尼人分不清黄色和橙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鉴于原实验具体细节难以考证，实验结论的原话也无从查取，我对此提出了自己的合理猜测，试着解释这一悖论：

操不同语言的人，即使语言中没有专门形容该颜色的词语，也依然有“觉察二者不是同一种颜色”的能力。对于斯尼人而言，同时呈现黄色和橙色，他们能够辨认出二者的不同；但单独给出其中某种颜色，则语言中有该颜色指称的词语就会优先跳出，不论这时给的是黄色还是橙色，他们都会用自己语言中已有的词去界定。如果他们的词语中只有黄色没有橙色，那么即使呈现出橙色，他们也会认为是黄色。必须注意的是，黄色和橙色的界定是从我们的语言文化中产生的，要受到我们自己固有语言色彩系统的制约。在这个案例中确实体现了语言对命名行为的引导性作用，并通过这种行为引导产生的对思维认知时的误导。这个道理很简单，如果何时再发现一个民族在黄色和橙色之间还有自己的界定，我们姑且将其标记为a色，那么当他们看到我们将a色笼统的归到黄色或者橙色之中时，会不会也觉得匪夷所思呢？不过这就相对弱化了色彩实验对语言相对论的证明力。因为既然所有人都有区别色彩的能力，且是否将其表达出来只是关乎语言系统对该色彩是否已作出符号标记，那么在这里语言对思维并没有产生直接的、巨大的影响力，毕竟某民族即使没有某特定色彩词汇也有区别该色彩与相邻色彩不是同种色彩的大脑思维，当然这需要将两种色彩对比同时呈现，否则就会习惯性的用已有的语言符号去标记两个或多个不同色彩。这一点在沃尔夫论及霍皮语中的一个特定名词——表示“飞行类减去鸟”（FC-B,flying class minus birds）——与英语中的鸟、飞机等物的区别时，也有类似的思想表述。

除此之外，“证实”实验在词汇、语法、认知、文化背景等方面的研究切入，也取得许多成就。证明语言确实对思维在不同层面、不同程度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学者针对这一假说提出了反驳，“证伪”实验和理论纷繁复杂，这里只择取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加以评析。为便于理解和讨论，我将其制为以下表格。

|  |  |  |
| --- | --- | --- |
| 实验/理论 | | 评析 |
| 相关人物 | 实验过程/反驳理由 |
| 伦纳伯格 | 说语言差异表现了行为和“世界观”的差异，不过是同义重复；必须区分言语行为和非言语行为，找到与语言差异相关的非语言行为。[[13]](#footnote-13) | “语言本身就是一种行为，一种世界观”的说法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正如卡罗尔所言，“语言相对论可能并没有表面显现的同义语重复的问题”。仅仅研究语言差异也是非常重要的。毕竟“非言语行为”本身也需要通过语言表述出来才能为人所感知，因为诸如冥想等心理活动无法从外界观察到。 |
| 帕尔默（F.R.  Palmer） | 人类语言具有共同的语义特征：这是因为人类生活在同一世界；人类具有基本相同的大脑特征；不同社会的文化需求是基本相似的；使用不同于语言的不同社会之间保持联系沟通；人类语言，具有共同的起源。[[14]](#footnote-14) | 这些所谓的“相同”很容易想象，也不可否认；但它存在的意义也就只是再次验证了“联系普遍性”、“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等高度概括化的哲学原理在语言学领域中的适用，它本身既没有提出关于语言和思维关系的新的论断，也没有有效的反驳沃尔夫假说；相反，只看到人类语言的共性，而对实际考察到的差异却给予沉默的“否定”。 |
| 哈德森（Hudson） | 思想的形成，总的来说是独立的过程，但与语言有关；人们依靠自然的结构和自身的交际、认知需求去剖析自然，而不是依靠语言。[[15]](#footnote-15) | 在人类语言产生之初，可能确实如此。但我们必须关注到语言的传承性。每一个个体从出生开始就被所在环境的语言包围，这种语言的一整套显性范畴和隐性范畴会对我们的思维形式进行规定和限定。打个比方，我们就像一只蜘蛛，出生时伏在父母或周围设定好的语言的蛛网上，我们的思维在通常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循着语言的蛛网前进，并一定程度的受到这个蛛网轨道的制约，如无意外，将沿着这些预定的轨道走下去；但蛛网会损坏、会拓展、会更替，这只蜘蛛某天也会看到别的蛛网，这就对应了里昂的看法，即一部分操本族语者在面对新的刺激情境时的认知需求所产生的语言需求，要求在本族语范围内进行语言创造突破；但变化的只是个别行为，一旦作为整体意识保留传承，就会拓展蛛网的范围，在下一轮传中作为母体被沿用。这个过程的良性循环，导致语言和思维的双重进展。对于蜘蛛而言，它不会意识到它是在沿蜘蛛网爬的；这就好像我们一旦接受一种语言，我们的思维就将不由自主而又毫无意识的被语言“牵着鼻子鼻子走”。 |
| 乔姆斯基 | 儿童有一个先天的语言装置，即“普遍语法”，它被描写为大脑的一个特别模块，是提前编好的用于加工语言的程序，它包括了所有语言都具有的普遍原则，儿童的任务是：发现他所在环境里的语言是如何使用这些原则的。[[16]](#footnote-16)“普遍语法就是构成语言学习者的初始状态的一组特性、条件和其他东西，所以是语言知识发展的基础。[[17]](#footnote-17)”人类的语言能力是如同人的器官一样，是自然生长出来的。[[18]](#footnote-18) | 我们不能因为沃尔夫师从结构主义语言学家萨丕尔就认为他的所有理论思想与转换生成语法学派完全对立，沃尔夫确实有结构主义研究传统，承认语言与语言在结构上的差别可以是非常大的，但同时他也关注到了语言之间的一些共性，发现了某些语法范畴的普遍性，并在后期提出了类似“普遍语法”的“高层自我”，这也可以说是沃尔夫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一次“反动”，在正文中将会详细阐述这一理论主张。 |

综上，目前学界对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反驳的并不十分成功，但对它的真值证实仍不够充分。假说悬而未决，仍然期待更多的学者对其作出研究和验证。不过所有的评判都应建立在对讲述内容的深刻理解和挖掘的基础上；接下来在正文中，我们将回归原作，具体客观的与沃尔夫本人做“思想交谈”。

**第一章**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思想内涵**

1.1作为假想敌的“语言决定论”

如前所述，“语言决定论”认为语言制约和决定了一个人的思维，语言不同，则其思维方式也不同。“语言决定论”常作为沃尔夫思想的一部分受到猛烈的抨击。沃尔夫原作中偶尔确实有这样类似的表述。在《Language,mind and reality》中，沃尔夫曾说：“……思维遵循特定语言设定的轨迹网络，这种组织结构会系统的关注某些时空的现实，某些方面的智能，并会系统的忽略被其他语言关注的侧面。个人对于所讲语言的这种组织方式，全然没有意识，丝毫无法挣脱它的束缚。”表面上看，沃尔夫在此处确实做了一个武断的、十分不明智的结论；但通过查找这篇论文的写作背景，我们发现，这篇论文发表于印度马德拉斯出版的一个通神学刊物上，是为一般读者而写的，沃尔夫无疑希望语言学为一般公众所了解[[19]](#footnote-19)，“他是第一个做现代语言学科普工作的人”，可能沃尔夫也明白，语言学要传达的信息必须对大众有吸引力，否则它的普及便不可能，且没有意义什么意义，基于此，我们可以做一个合理推测：之所以偶尔跳出稍微缺乏客观理性色彩的论断，可能正是因为沃尔夫想迎合并激起一般公众的兴趣。正如鲍文所言，“他本人不大可能意识不到语言决定论导致的逻辑矛盾。”[[20]](#footnote-20)

除此之外，查之原作，沃尔夫在表述观点时都会使用“在某种程度上”、“极少”、“至多”等限定性词汇；萨皮尔也认为是“语言促使我们对世界选用某种解释”，注意他用的是“促使”而不是“决定”，由此看来我们不应当把他的理论理解为“语言决定论”，“否则就背离了二人的本意”，他们在尽可能的激起大众对“语言制约思维”这一现象关注的同时也冷静的、不着痕迹的暗示思维也能够突破语言框架的约束。

综上，语言学界给自己立了一个“假想敌”，“语言决定论”违背了萨丕尔和沃尔夫的本意，他们不应为后世某些学者的“画蛇添足”“背黑锅”，不过这也从反面证实了“请从其源”、回归原作的重要性。

1.2沃尔夫对语言相对论原则的阐述

沃尔夫的名字在人们的大脑中似乎与“语言相对论”建立了某种“刺激—反应”的联系，就像爱因斯坦与其相对论一样；是否可以这样类比是一个未知数，但美国语言学家卡罗尔确实曾对其给予高度评价：“历史上偶尔会出现这样的人：他们能在以往看来毫不相干的事物之间捕捉住某种联系，由此为人类提供新的知识维度。揭示了时空相对性的爱因斯坦便是这样一个人。在另一个领域较为微观的层面上，本杰明·李·沃尔夫也是这样一个人。……沃尔夫捉住了人类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关系，揭示了语言究竟如何构筑我们内心深处的思想。[[21]](#footnote-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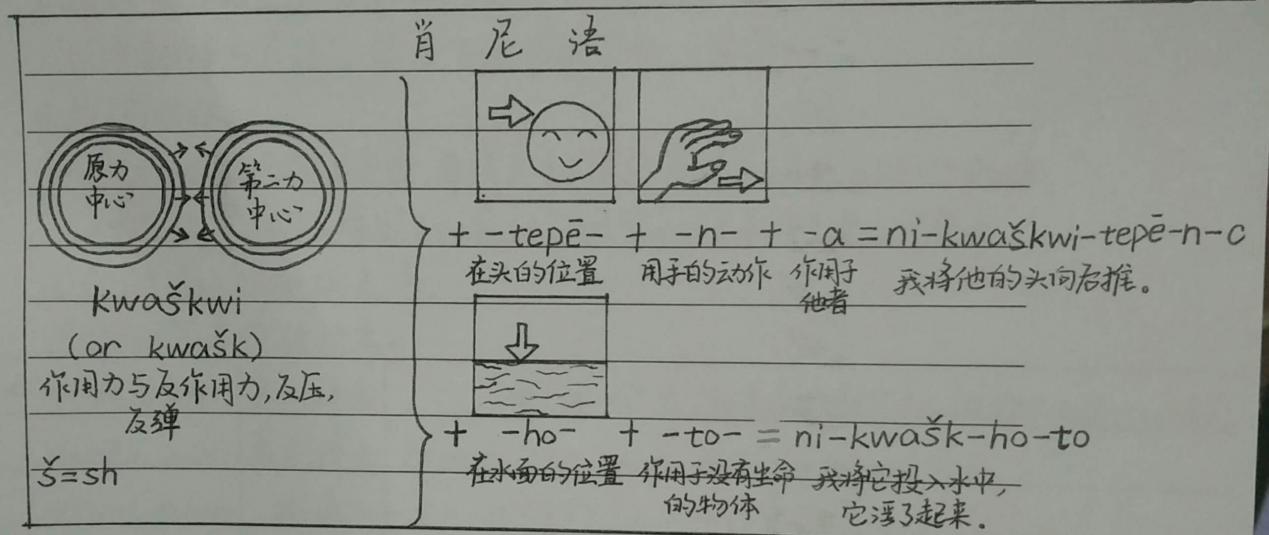
事实上，沃尔夫本人从未明确的提出“语言相对论”，但是他确实对“语言相对论原则”有过清楚的论述。

“由此即引出了我所说的“语言相对论原则（linguistics realitivity principle）”，用通俗的语言来讲，就是使用明显不同的语法的人，会因其使用的语法不同，而有不同的观察行为，对相似的外在观察行为也会有不同的评价；因此，作为观察者他们是不对等的，也势必会产生在某种程度上不同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是朴素的，未经概括的。人们可以对孕育了这种世界观的基本语法型式进行更高层面的特征概括，从而由每一种朴素的世界观发展出一种清晰的科学世界观。由此看来，现代科学的世界观是根据西方印欧语言的基本语法特征概括而成的，当然这并不是说这种语法导致（caused）了科学的产生，它只是影响（colored）了科学。”

在这里，沃尔夫特别强调语言的语法型式对观察行为的影响（沃尔夫认为“说”就是“做”，言语和行为之间不存在对立；同样，“思考”和“谈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施加于材料事实之上的语言使用”[[22]](#footnote-22)）。沃尔夫认为，语言对说话者的制约作用就像万有引力之于人，是必然而无意识的；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模式或型式，这些型式构成了语言形式化（即外在表现和隐性制约的相加，但不仅仅是简单的表面的相加，而更类似于一种“整合”）的一面，即“语法”。这里的“语法型式”超出了我们平时在课本上所学的语法内容，是更广义的“语法”，它提供给个体一个无意识、无处不在的“语言背景”或者说“语言场”。“背景性的语言系统（或者说语法）不仅是一种用来表达思想的再生工具，而且它本身也在塑造我们的思想，规划和引导个人的心理活动，对头脑中的印象进行分析，并对其储存的信息进行综合……我们用自己的本族语所划的线切分自然，用各种概念将它组织起来，并赋予这些概念不同的意义。这种切分和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契约，即我们所在的整个语言共同体约定以这种方式组织自然，并将它编码固定于我们的语言型式之中……这一契约是隐性的，并无明文规定，但它的条款却有着绝对的约束力，如果我们不遵守它所规定的语料的编排和分类方式，就根本无法开口说话。”[[23]](#footnote-23)

据此，沃尔夫根据他所观察的美洲印第安语列举了许多例子加以阐释。这里只举肖尼语的例子，配图说明，并加以解释论证，以探究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语言背景是如何影响不同语言个体的思维的。

在英语中，“I push his head back.”和“I drop it in water and it floats.”不论是动词给人的感官感觉还是动作的性质和数量，甚至描述的角度都是很不相同的。当我们把它译为汉语时，“我把他的头向后推”和“我把它投入水中，它浮了起来”也是极不相同的。我们甚至会诧异，比较这样两个句子有什么意义？稍等，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肖尼语中这两个句子又是如何表述的。



在肖尼人的语言系统中，用“kwaskwi”标记“推”、“投”、“浮”过程中发生的“作用力”，在我们眼中三个截然不同的动词概念在他们的语言范畴中却是同一回事；且就句子构成来看，两个在英语和汉语中语序都不相同的语句在肖尼语中陈述却非常相似。沃尔夫由此得出结论：在自然分析和事物分类中，语法决定了某些东西是否相似或归为一类（逻辑），自然逻辑学家凡夫先生也认为，“对于语言不同的人来说，事实各不相同，因为语言背景提供了不同的事实形式。”[[24]](#footnote-24)

如果感觉肖尼语的例子与我们的心理距离有些遥远，那么我们不妨将寻找语言影响思维粒子的目光投放到最熟悉的汉语与“比较熟悉”的英语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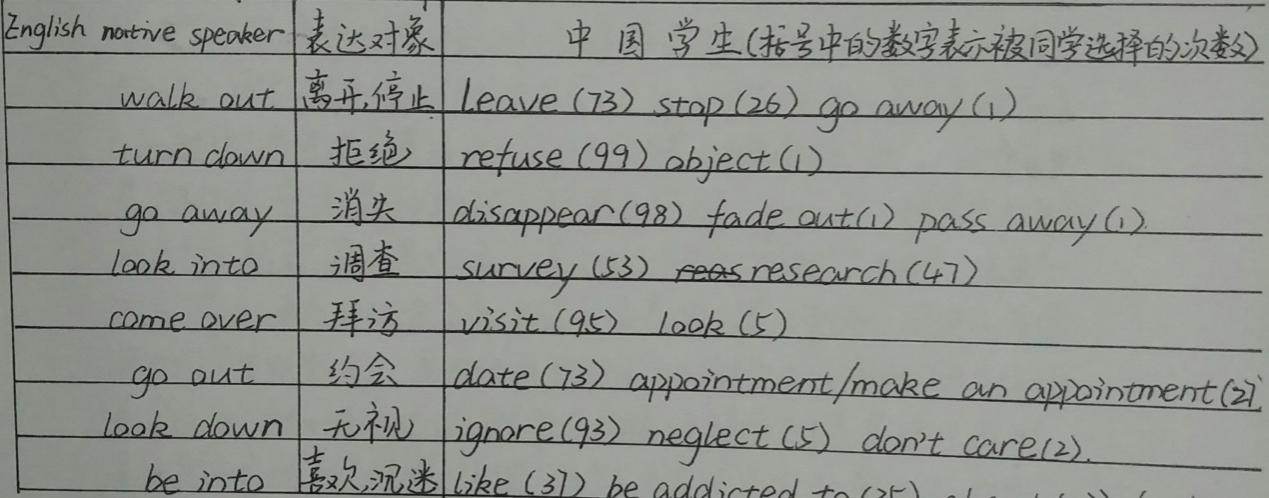
韩国学者权恩熙在调查韩国人使用英语动词时发现，他们与“English native speaker”使用的动词在表达相同的概念时对动词的选择有很大的不同[[25]](#footnote-25)。这一发现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想知道讲汉语的人（指母语或第一语言为汉语的人）用英语进行相同的意思表述时所取的动词是否与以英语为母语的人的选择一致呢？由于条件有限，我仅随机抽取了一百名来自不同专业、英语水平不同的人作为调查样本，将权恩熙的关于以英语为母语的人的选择作为参照，设计了以下实验过程：

①编好调查表上的要求和内容——“请凭第一感觉，迅速将以下汉语翻译为英语”，然后下面罗列八个汉字词；

②打印105张；

③分发给调查对象调查表，并请其标注上英语四级或六级的成绩，以最高次算，成绩保密（以免引起同学心理不适），故调查表回收时以折叠状交还。

以下是实验结果：



上表中，“English native speaker”下列的词只是表示在表达某种意思时，大多数人更倾向于使用的词或词组；将调查到的中国学生翻译使用的词语之相对比，我们发现中国学生在表达一个含谓词性质、含动作属性的意思是，几乎都不约而同的使用了英语中单个的实义动词，而“英语人”则更多的使用了“基本动词+介词”的形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将“英语人”的答案展示给同学，他们表现出“啊，是这样，其实他们这样说我也能听懂，但是我自己不会主动去使用这样的表达形式。”如果我们假定，相对于汉语，“基本动词+介词”的概念表达，是英语中一个极富特色的词义引申方式；我们再假定，使用“基本动词+介词”的心理适应度与熟练度同学生的英语成绩、英语思维培养成正相关，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取得较高英语成绩的学生，并没有比较低成绩的学生更会使用这一结构，其英语思维并未因其成绩高而优于其他人；换句话说，学生在翻译英语时仍未摆脱汉语思维的困扰，因为汉语中一个动词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也无所谓“+”组成一说，这种语言表达的固定模式浇筑了我们在认识世界上时，都将一个动作凝成一个整体，加以记忆并储存在大脑中，成为“汉语思维”的一部分，因此当我们翻译成英语时，大脑中“一个动词=一个动作=一个整体”的固有模式，引导我们把一个个汉字词译为在形态上一个个“独立”、“孤立”存在的“模块”，而英语中的实义动词恰好满足了我们的需求，由此便看到了上图所显示的实验结果。以“get off”为例，在英语人的大脑中（或者说在英语中），“get”的基本概念是“动”，“off”的基本概念是“从某种物体上脱离”，因此，“get off”的基本概念就是“动起来，离开某物体”，并由此引申出“逃脱”、“出发”、“远离”、“下车”等义，甚至有些含义无法用汉语表述。英语中的介词使用常常是中国学生的软肋，“基本动词+介词”的结构与汉语的相关结构差异过大，导致讲汉语的我们的大脑对接受附着英语思维的某些英语表达十分吃力。这便证明了语言对思维的塑造和引导作用。我们在用语言表达的同时，语言也在影响着我们的思维。

综上，根据沃尔夫的语言相对论原则，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两个世界当中：语言构筑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这两个世界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我们往往将无意识的建立在自己社团语言习惯基础上的世界当作现实世界，这种认识有时正确，有时又与真实相差甚远；讲不同语言的人所看到的世界不同，对它的划分和评价也不同，这种差异时大时小。“外来语言是我们的镜子”[[26]](#footnote-26)，我们应当多去审视自身和其他民族思维的语言背景。

**第二章**

**沃尔夫对语言普遍性的关照**

在《Grammatical categories》一文中，沃尔夫详细讨论了三对语法范畴的普遍意义。他认为，虽然我们不应当使用讨论自己语言语法的术语去描述其他语言，但必须承认，用全球视角来观察语言现象，重新审视在语言中发现的各类语法范畴，在某种新的意义上建构和修订概念，对其予以特征概括，使之能够“简洁的说明所有已知的和可以推测的语义及形态事实”是十分必要的，以下三对语法范畴具有普遍的语法学和心理学意义，不失为人类共同的思维方式之基础，因而具有较高的普适性和较好的代表性。

2.1显性范畴和隐性范畴。

根据沃尔夫的理论，一个显性范畴是一个具有形式标记的范畴，这一标记出现在包含此范畴一个成分的每一个句子中（只有很少的例外）。范畴是纵聚合关系的统摄单词，标记则可能是一个单独的词或整个句子的某个特定型式。比如，英语中名词的复数是一个显性范畴，通常表现为词形变为词的后缀“-s”或元音变化，极少有例外；另外，动词的可能语气也是一个显形范畴，用词素“can”或“could”标志出来，这个词语在一个句子中是与动词分离的，但它出现在包含这一范畴的每一个句子中。

隐性范畴的标记只出现于某类句子，而不是出现于某个词或某个成分所属范畴的每一个句子中。词的隐性类别一般看不出来，只有当这个词被使用，或者在一些特殊的句型中被提到，我们才会发现这个词属于某一类，需要某种区别性处理，甚至是排除整个句子类别的否定性处理。这种区别性的处理我们可以称为该范畴的“反应特征（reactance）”，比如英语中的不及物动词是一个隐性范畴（汉语中也有“不及物动词”，不过我们通常按照配价理论将其解释为“一价动词”，如“地震”，“下雨”等），其标记是不具备被动分词、被动语态和使役语态，这是从结构上定义的不及物，不同于英语传统语法中的“不及物”，后者是由前者和其他的一些明确的语法特征（如：动词后不带名词或代词）来标志的真正的语法类别。

另一类隐性范畴是英语中的性。每一个普通名词和个人的名字都属于一个特定的性类别，这种新类别不像法语中用显性符号做标记，相反，它只有在用单数人称代词指称名词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典型的显性标记；否则，如果是中性，则可用疑问代词或关系代词“what”、“which”作标志。比如“Jane”属于“她”类而“John”属于“他”类；小型动物用“it”；大型动物常用“he”；狗、鹰和火机常用“he”；猫常用“she”；身体部位和整个植物借用“it”；鬼魂用“it”；自然用“she”，等等。本族语中没有性属的学习者，在英语性属方面常犯错误，这些错误明确表明英语中的性是一个隐性范畴，而不是自然的、非文化的差异在语言中的反映，隐性范畴也可称为“隐型”，他们很容易被忽略，也很难定义，但是会对语言行为有深刻深远影响。正文第一章调查报告中汉语“光杆动词”与英语相比，缺乏介词匹配也可视为一个隐性范畴。

2.2选择范畴和系数范畴。

选择范畴是一个成员固定而有限的语法类别。其中，词位（lexemic）范畴是一个基本选择范畴，在它之上的范畴是特定语言的全部词汇。词位本质上具有一种“划分类别”的属性，它应当涵盖该语言的全部词汇。“某个语法特征，如果要存在于词位之中，就不能存在于所有词位之中”。词位范畴既可以是隐性的，也可以是显性的。词位范畴不仅包括名词、形容词、动词和其他词类，而且还包括实词和虚词或词根词缀等。

系数范畴是一个非选择性范畴，即大体上是可以任意使用和删除的，它可以用于“主词”（除了较小的、专门的选择类别，如“小品词”之外的任何词语），或者更经常的应用于处于具有某种先决条件的较大范畴之中的任意词，这一范畴可以是选择范畴或另一个系数范畴。比如据沃尔夫和特拉格考察印欧语和阿兹特克—塔诺周语言中的格、时态、体、情态和语态是系数范畴，可以任意应用于适当的较大范畴——格是名词范畴的系数；体、时态是动词范畴的系数。而对于汉语这种讲求“意会”、对语法结构要求极低的语言来说，其系数范畴相当广泛，几乎容纳了所有的系数类别。

2.3具体范畴和一般范畴。

具体范畴是在单个语言中存在的单个类别，例如：英语中的被动语态，霍皮语中的链续体，汉语中的“把”字句等。一般范畴，从狭义的、某一特定语言的角度而言，是一个由相似或（和）互补的类别组合而成的层次结构，例如拉丁语中的格、霍皮语中的时态。理想的情况是，这种一般范畴应反映语言本身所包含的系统。表面上意义相对立的具体范畴，如被动语态和主动语态，只有当他们有两个以上或者只有两个，但二者放在一起形成一个对立于其他形式系统的单位时，才能被归入一个一般范畴（“语态”）。

综上，沃尔夫在注意研究语言相对性的同时，也关注到人类语言和思维关系的普遍性，并据此提出了三对范畴。显性范畴承认人类语言对思维的标记性，隐性范畴承认这种标记性具有相对性；选择范畴承认语言的层次性，系数范畴则承认语言的灵活性；具体范畴承认语言自身的特性，一般范畴则承认与特警中的共性。由此可见，沃尔夫既提倡在描写语言时尊重语言自身的特点，对其特点给予充分的表现；也认为有些语法范畴是描写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应忽视的，它可以为我们提供可能的研究思路和操作性的符号表达方式。相对主义和普遍主义在这里得到完美的融合，二者并不矛盾，反而是辩证的统一。普遍主义的提出，也为“最高型式”的概括埋下了伏笔。

**第三章**

**关于高层自我**

在解释沃尔沃的“高层次我”之前有必要再次回顾一下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学界通常认为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动摇了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根基，对假说产生了颠覆作用，乔姆斯基认为存在着普遍适合所有语言和文化的规律和原则，语言的普遍规则是由一体系列固有属性和内在条件所构成的，这些条件与生俱来，它们不仅是人类语言中最本质的东西，而且是成功的习得语言所不可缺少的东西。人类的语言能力是如同人的器官一样，是自然生长出来的，它体现在人脑神经系统的一定结构和活动中[[27]](#footnote-27)。乔姆斯基在对普遍语法的物质层面尚不清楚的情况下，提出的这一理论十分大胆。

前面已提到，沃尔夫由于师从萨片而被同归入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的范畴，可以说这一规律本身就是缺乏理论依据的。学生确实会受老师的影响，并继承其部分思想，但继承的同时也在不断完善发展，甚至推翻这一思想。历史上不乏其例。而且，将沃尔夫的研究方法笼统的归于逻辑实证主义和心理学上的行为主义而作为建立在理性主义哲学基础之上的普遍语法的“靶子”，这也是一个空洞的逻辑，我们应当有勇气去透过经这些“科学的”词语粉饰打扮过的含糊概念的表面去探求它们的实质，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我们将会发现，普遍语法和假说可能并不矛盾；如果一定要认定二者对立，那么与其说是乔姆斯基推翻了沃尔夫假说，不如说沃尔夫自己推翻了自己。

沃尔夫将语言现象分成了以下几个层面[[28]](#footnote-28)：

|  |  |
| --- | --- |
| 最高形式 |  |
| 句法层面 |  |
| 形态层面 |  |
| 词素—音位层面 |  |
| 生理—语音层面 |  |
| 物理—声学层面 |  |

沃尔夫认为，句法层面之上的“其他层面”十分重要，虽然目前对它不甚清楚，“但对它们的全面了解，将来可能会让我们惊讶不已”，我们的大脑/心理会选择词语，但却难以察觉型式，就好像被一个更高级、更富有智慧的大脑玩弄于掌心，这个更高级的大脑或高层心理不大清楚房子、床、汤锅这样的概念，但能够将概念系统化、数学化，其范围之广、层次之多，没有任何学校的数学家可以企及。

沃尔夫由此兴奋地断言：人类在这方面是相同的。“从语言的系统性来看，巴布亚蛮人有着与爱因斯坦相当的数学能力。反过来，人们都以同样不清醒的方式运用着自己的意识，陷入同样的逻辑僵局。”“高级层面的心理好像可以成就任何纯粹智力的伟业，但却不能进入个人的意识层面”，“我们可以将它称为高层自我，看作出现于每一种语言的特征。”“这个高层次我可作用于任何语言系统——一个小孩能以同样的轻松和效率学习任何语言，无论是由各有声调的重读单音节构成的汉语，还是有许多一字之句的温哥华岛的努特卡语。”由于高层心理具有系统、构型的性质，语言的“型式化”总是高于并制约词汇化和命名。“高级心理处理的符号并没有固定的所指，而是像空白支票一样根据需要被填写，它们表示特定变量的任意值，就像代数中的x、y、z”，“有特定特确切意义并代表特定事物的词语，只是变量的一个值。”最粗野的蛮人也能够在下意识中轻松操纵语言系统，这个系统如此复杂，即便“最伟大的学者，也需要花费毕生的精力，才有可能将其机制描述出来”[[29]](#footnote-29)。“高层自我”是赋予所有人的。

沃尔夫对“高层自我”的论述中，我们仿佛看到了普遍语法的影子。二者都认为存在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语言机制，这种语言机制为全人类所共有，它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和条件，延伸出不同的隐申意义或语言系统，但二者的侧重点似乎又有所不同，高层自我侧重于词汇化制约影响；普遍语法，则从宏观层面解释人类语言的生成。

现代语言神经机制研究表明，语言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它涉及各个不同脑区大量神经细胞及激活网络的活动[[30]](#footnote-30)。比如布洛卡区和韦尼克区，分别在语言的言说和理解方面起着主导作用，但实际情况更加复杂，脑功能定位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功能区的界限也不是明确固定的。人类语言能力的形成以及在大脑皮层中的定位，不仅与大脑神经连接布局有关，也与后天训练使用时对大脑各区位的“争夺”有关。“对于特定成熟大脑的脑区功能定位分布，实际上完全应看作是长期神经活动彼此消长相互作用的结果，是整体神经活动中各输入激活刺激源相互作用、竞争的产物。”[[31]](#footnote-31)这就为普遍语法和高层自我提供了神经学原理支持——这个“人类语言最本质的东西”，可能正是人脑中庞大的神经网络活动和脑区功能的适应性争夺有关。

**第四章**

**总结**

沃尔夫素来语言相对论著称，他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机敏的捕捉住了人类语言和思维之间的关系，揭示了语言究竟如何构筑我们内心深处的思想。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依照沃尔夫本人的说法，他所提出的是一“原则”而非“假说”。根据这一原则，“同样的物质证据，并不能使不同的观察者得到同样的宇宙图像，除非他们的语言背景相似，或者用某种方式校准。”一种语言的复杂系统会制约一个人的思维方式，而且这种制约对于个人而言是无意识的。语言这个型式系统包含了由文化规定的形式和范畴，个人不仅用这些形式和范畴进行交流，“而且也通过它们来分析自然、注意或忽略特定种类的关系和现象，引导推理过程，构筑自己意识的房屋。”[[32]](#footnote-32)“语言决定论”背离了沃尔夫的本意，应当予以摒弃。

这一相对主义思想，几乎贯穿了沃尔夫的所有研究。但同样贯穿其所有研究的，还有看似与相对主义对立的、有关语言和思维的普遍主义思想。为此他提出显性与隐性、选择与系数、具体与一般三顿饭愁加以论证，认为这三对范畴具有高度的普适性，在研究对比各种语言时可以为我们提供可能的研究思路和操作性的符号表达方式。普遍主义的提出也为“高层自我”的概括埋下了伏笔。

“高层自我”是一系列“出现于每一种语言的特征”，它可以作用于任何语言系统；而各种特定语言系统中的不同参数值之于它，就如同代数中的具体数值1、2、3之于未知数x、y、z。抛开所谓的“学派对立”，这一理论与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确实有相似之处。不过高层次我侧重于对词汇化过程的制约影响，普遍语法则从宏观层面试图解释人类语言的生成。

由此可见，“语言相对论”只是沃尔夫丰富思想的一部分，这也正是此次论文题目称“沃尔夫理论”而不称“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原因，“沃尔夫假说”的表述方式未必是沃尔夫的本意。未来，期待更多的学者在“请从其源”的基础上，对沃尔夫思想进行深入挖掘，对语言相对论进行探索论证。

**参考文献：**

1. 桂诗春.《什么是心理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2. 桂诗春.《新编心理语言学》.
3. 纳日碧力戈.《语言人类学》.
4. 鲍文.《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研究》.硕士论文.2007.
5. 鲍文.《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解析》.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8,9(4):629—632.
6. John B.Carroll.《论语言、思维和现实》.高一泓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
7. 张雪梅.《萨皮尔—沃尔夫假说新探》.安徽大学学报.2001.第25卷第3期.
8. Norbert Schmitt.《应用语言学入门》.徐金明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
9. 权恩熙.《形象图解英文原理》.干太阳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
10. 周昌乐、唐孝威.《语言神经机制的新认识》.心理科学.2001.第24卷第4期.
11. 李大伟.《第二语言学习的神经机制》.当代教育科学.2007第19期.
12. 周祖德、王遂平、冯刚毅、李国超.《语言理解中予以整合的神经机制》.心理科学.2011.34(5):1062—1067.
13. 许亮、杨巍.《语言与大脑简述语言习得的神经机制》.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第27卷第1期.
14. 刘欢欢、陈保国.《语言转换的认知及其神经机制》.心理科学.2015，38（1）：98—103.
15. 吴越民.《英汉词语的不等值现象与跨文化差异》.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第33卷第4期.
16. Geoffrey K.Pullum.《Sasha Aikhenvald on Inuit snow words： a clarification》.2004
17. Geoffrey K.Pullum.《The great Eskimo vocabulary hoax》.
18. Benjamin Lee Whorf.《the relation of habitual thought and behavior to language》.1939.
19. Fishman.J.《The Whorfian hypothesi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 Palmer. F.R.《Sema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1. Hudson。R.A.《Sociolinguis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2. Chomsky.A.N.《Rules and Represent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
23. Benjamin Lee Whorf.《Linguistics as an exact science》.1940.
24. Benjamin Lee Whorf.《Science and Linguistics》.1940.
25. Benjamin Lee Whorf.《Languages and logic》.1941.
26. Benjamin Lee Whorf.《Language， mind and reality》.1942.

1. 桂诗春.《什么是心理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footnote-ref-1)
2. 鲍文.《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研究》.硕士论文.2007. [↑](#footnote-ref-2)
3. 鲍文.《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研究》.硕士论文.2007. [↑](#footnote-ref-3)
4. John B.Carroll.《论语言、思维和现实》.高一泓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 [↑](#footnote-ref-4)
5. John B.Carroll.《论语言、思维和现实》.高一泓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 [↑](#footnote-ref-5)
6. Benjamin Lee Whorf.《the relation of habitual thought and behavior to language》.1939. [↑](#footnote-ref-6)
7. Geoffrey K.Pullum.《Sasha Aikhenvald on Inuit snow words： a clarification》.2004 [↑](#footnote-ref-7)
8. 桂诗春.《什么是心理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footnote-ref-8)
9. 张雪梅.《萨皮尔—沃尔夫假说新探》.安徽大学学报.2001.第25卷第3期. [↑](#footnote-ref-9)
10. 鲍文.《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解析》.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8,9(4):629—632. [↑](#footnote-ref-10)
11. Fishman.J.《The Whorfian hypothesi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otnote-ref-11)
12. 鲍文.《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研究》.硕士论文.2007 [↑](#footnote-ref-12)
13. John B.Carroll.《论语言、思维和现实》.高一泓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 [↑](#footnote-ref-13)
14. Palmer. F.R.《Sema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otnote-ref-14)
15. Hudson。R.A.《Sociolinguis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otnote-ref-15)
16. Norbert Schmitt.《应用语言学入门》.徐金明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 [↑](#footnote-ref-16)
17. Chomsky.A.N.《Rules and Represent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 [↑](#footnote-ref-17)
18. 鲍文.《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研究》.硕士论文.2007. [↑](#footnote-ref-18)
19. John B.Carroll.《论语言、思维和现实》.高一泓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 [↑](#footnote-ref-19)
20. 鲍文.《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研究》.硕士论文.2007. [↑](#footnote-ref-20)
21. John B.Carroll.《论语言、思维和现实》.高一泓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 [↑](#footnote-ref-21)
22. Benjamin Lee Whorf.《Linguistics as an exact science》.1940 [↑](#footnote-ref-22)
23. Benjamin Lee Whorf.《Science and Linguistics》.1940. [↑](#footnote-ref-23)
24. Benjamin Lee Whorf.《Languages and logic》.1941 [↑](#footnote-ref-24)
25. 权恩熙.《形象图解英文原理》.干太阳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 [↑](#footnote-ref-25)
26. Benjamin Lee Whorf.《the relation of habitual thought and behavior to language》.1939. [↑](#footnote-ref-26)
27. 鲍文.《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研究》.硕士论文.2007. [↑](#footnote-ref-27)
28. Benjamin Lee Whorf.《Language， mind and reality》.1942. [↑](#footnote-ref-28)
29. Benjamin Lee Whorf.《Language， mind and reality》.1942. [↑](#footnote-ref-29)
30. 周昌乐、唐孝威.《语言神经机制的新认识》.心理科学.2001.第24卷第4期. [↑](#footnote-ref-30)
31. 周昌乐、唐孝威.《语言神经机制的新认识》.心理科学.2001.第24卷第4期. [↑](#footnote-ref-31)
32. Benjamin Lee Whorf.《Language， mind and reality》.1942. [↑](#footnote-ref-32)